

超级连接、规训权力与数字生命政治

——人的主体性视角下的现代媒介技术再审视

李璘琦

【摘要】作为对既往媒介技术研究中“技术决定论”“媒介物质性”的反思，本研究对现代媒介技术发展中日益凸显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予以重视，借用人的主体性三维框架重新审视现代媒介技术，以此把握现代媒介技术的本质，探寻人在媒介技术的未来发展中实现自我解放的可能性。研究认为，人的主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人作为关系主体；人作为权利主体；人作为欲求主体。从人作为关系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了人类的超级连接与秩序重构；从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本身具有规训权力的属性，亦引发了技术的“全景敞视主义”；从人作为欲求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了向数字生命政治的跃进，其未来的价值指向应是“回归自我”的人的生存美学创造与人的主体性解放。对媒介技术的审视应超越人与物之间的分野，从技术的表象中看到人的存在，媒介技术的未来发展也应围绕人的主体性来进行。

【关键词】现代媒介技术 人的主体性 超级连接 规训权力 数字生命政治

【作者简介】李璘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1)05-0033-12

一、引言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现代技术已经作为一种新的、特定的环境嵌入人类的生存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社会现象无一例外都会置身其中……如今，现代人的心灵状态已经受到了技术的价值支配。^①随着现代媒介技术^②的发展，超载的信息把人束缚在数字化的“赛博空间”中，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模式和生活结构。一方面，不断迷失的真相使客观的理性世界变得越来

①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Order*, in John G. Burke and Marshall C. Eakin, eds., *Technology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Boyd & Fras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3-14.

② 现代技术是在机械自然观的影响下而产生的科学化的技术，是对古代附魅技术的祛魅。祛魅后的现代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精神的匮乏以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因此遭到多方批判。参见黄欣荣、庞世伟：《论技术的现代性及其后现代转向》，《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85~89页。本研究所讨论的现代媒介技术是现代技术的一种形式，它以互联网为基底并强调数字化，从广泛意义上讲，它是基于大数据、算法或人工智能的媒介技术。

越扑朔迷离；另一方面，全球数十亿网民使用的各类数字社交平台因其霸权式、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被数度声讨。尽管媒介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身体的能力，从而使人在表面上获得了一种高效的生活方式，然而，人们并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在向着一个更有智慧的时代、更繁荣的全球经济高歌猛进，还是陷入了社交控制和监视的反乌托邦的泥淖”。^① 现代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技术的世界并不孤立，也绝非自成一统，它与来自看似遥远的人类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② 面对现代媒介技术冲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吴飞指出，应认真梳理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出现之后，其所带来的与人类本身的存在与主体性等方面有关的问题。^③ 王敏芝亦认为，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仍需要重申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以此作为考察技术与文化、机器与人性的基本立场。^④ 可见，在对媒介技术的审视中，人的主体性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和价值性要素。

当前，人的主体性在现代化社会的自动化运行过程中已被技术逐渐抽离和驯化。前文所述的人与现代媒介技术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都表明，面对现代媒介技术，我们还没有真正认清其特征与风险、嬗变与未来，而是在现代媒介技术所形成的技术环境之中不断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和探索新的意义。如雅克·埃吕尔所说：“在技术自我增强方面，技术越来越独立于人而走自己的路。这意味着人类越来越不积极地参与技术创造……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必须以数学的精确性来达到它的结果，它的目标是消除所有人类的可变性和弹性……机器取代人的程度往往比人们想象中的要更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作用仅限于检查。”^⑤ 然而，媒介技术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美好生活、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在媒介技术与人的互动过程中，我们需要回归人的主体性视角，即从“人的自我存在”出发，对媒介技术进行再审视，以此把握媒介技术的本质及特征，反思媒介技术对人的影响，进而追问人在媒介技术的未来发展中实现自我解放的可能性。

二、现代媒介技术再审视：回归人的主体性之必要性与可能性

历次信息革命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同时又对人的主体性产生了巨大影响。^⑥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所述的“我思故我在”让人类的理性主义占据了制高点，并让人类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抛弃了宗教神性的花环，^⑦ 但其客观上亦强化了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等人塑造的机械论世界图景，让世界只存在于机械化、量化的表达之中，而把人的自主、创造等主体性价值排除在外。^⑧ 在西方启蒙理性运动之后，现代性^⑨成为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理性化运行机制和规则。^⑩ 这是一种看似合理的宰制观念，强调世界的真正统一

① [美] 希瓦·维维亚那那：《谷歌化的反思》，苏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② [美]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③ 吴飞：《新闻传播研究的未来面向：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48~158页。

④ 王敏芝：《算法时代传播主体性的虚置与复归》，《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66~175页。

⑤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4, pp. 135-136.

⑥ 黄鸣奋：《新媒体时代电子人与赛博主体性的建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66~171页。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⑧ [美] 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下卷）：权力五边形》，宋俊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7页。

⑨ 现代性意味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次最深刻的、全方位的断裂，是人类社会的内在图式、运行机理、立根基础、文化精神的根本性转变。参见速继明：《资本与技术：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⑩ 速继明：《资本与技术：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解读》，第135页。

在于它的物质性和客观理性。西欧工业社会以降，人类才开始真正地把握生活模式与机器生产的统一步调，以达成人与技术的互嵌、和解。人们从过分强调技术的“工具化”“量化”形态转向人一机之间的互动，在关注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人自身的问题。此时，关于技术的形而上学更广泛地涉及对“技术与人类社会如何相互作用”以及“技术是否有其‘真善美’”等问题的质询。

（一）必要性——现代媒介技术给人的主体性带来冲击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对媒介的分析不能缺少社会观照，更无法回避“人”在媒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①数十年来，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媒介系统的结构与权力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人是媒介的主体”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明显的冲击。^②在媒介技术研究领域，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媒介技术进行了形而上层面的关注。他们的讨论强调了技术作为“物”的中心性与本体论存在，他们对媒介技术的存在进行的合理性阐释基本上以“技术决定”和“物质性”作为聚焦点，这两种媒介技术研究视角大致可以概括为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和媒介物质性的视角。^③在这两种视角下，对媒介技术的分析更多指向现实经验，注重以描述技术的方法考察技术实践的过程，其重点不在于围绕人的主体性实践去理解媒介技术，而在于从宏观上阐释作为物质的媒介技术将如何主导人的生活 and 生存环境。例如，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新的媒介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人的思考和生活方式，新的媒介为社会生活引进了新的尺度。此时，媒介技术具有鲜明的“相对于人的”主体性特征。对此，雅克·埃吕尔批评道：麦氏显然夸大了新媒介的影响，使其成为我们社会中发生的一切的唯一解释。^④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各个层面上参与着技术体系，^⑤新媒介并不是控制人类社会的主导者，是新技术的出现催生了功能各异的新媒介。这一批评也使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问题浮现出来，即在人参与技术体系的过程中，人作为主体通过改变技术的运行模式和实践效果创造新的媒介，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然而，可以看到，现代媒介技术给人的主体性带来的冲击使众多学者不断陷入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观念中，重点关注技术的主导作用，从人的主体性视角出发的反思则相对滞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在对媒介技术的审视过程中，一切出发点都应在于人的存在：因为人创造了媒介技术，人的生存是媒介技术存在的根本目的，人能够在媒介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自我决定、自我认识，媒介技术离开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人是主体，即“人在观念中被理解为根本目的的同时被理解为自我决定者”。^⑥因此，对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审视来说，回归人的主体性视角具有必然性，从这一视角出发去理解媒介技术，会还原媒介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引发的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

（二）可能性——人的主体性框架的三重维度

人对于自身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当时的形而上学便在追问事物的存在和本质问题时

①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6-76.

② 吴璟薇、郝洁：《智能新闻生产：媒介网络、双重的人及关系主体的重建》，《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2期，第78～97页。

③ 吴璟薇、曾国华、吴余劲：《人类、技术与媒介主体性——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克莱默尔媒介理论评析》，《全球传播学刊》2019年第3期，第3～17页。

④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trans. Joachim Neugroschel,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0, p. 9.

⑤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trans. Joachim Neugroschel, p. 13.

⑥ 罗骞、滕藤：《技术政治、承认政治与生命政治——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三条进路及相应的政治概念》，《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28页。

将视角逐渐从自然世界转向人类本身。因此,对各类事物进行审视的初衷实际上超越了“自然之物”本身的意义转而关注人的价值,即关注人的主体性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反思。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①马克思的观点表明,理解事物需要将其纳入人的实践过程中,应当从人作为主体的能动角度去审视事物的客观规律。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观点主要是人作为活动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②其中,能动性侧重主体对“关系”的把握能力,其基本内涵体现为人在建构“关系”过程中的生产、创造等实践能力。如马克思所言,人作为主体所进行的各类生产实践活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③“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④自主性侧重于“主体权利”,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平等权利的实践。自为性侧重于“主体欲求”,即人的欲望和追求成为主体活动的基本目的。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人的主体性框架可以概言为“人作为关系主体、权利主体和欲求主体”。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主体性与真相》中也聚焦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他提出用“自我技术”作为人的主体性回归的必要手段。在这里,“自我技术”实际上包含了人“如何处理自我”“如何处理关系”“如何批判权力”,最终实现“自我治理”的生存美学这一目标的过程。^⑤在福柯看来,人的主体性回归必然需要经历人对“关系”“权利”的把握进而实现人的“欲求”和“价值”。福柯所言的人的主体性概念实际上也包含了人作为“关系主体”“权利主体”“欲求主体”的实践。罗骞等在阐述人的主体性问题时则特别强调了人对权利的把握和人对欲望的追求,这两点实际上是马克思和福柯的人的主体性观念的延伸,即人被理解为拥有权利的主体,是规范层次的主体性概念。这表明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将成为现代的基本原则,而人被理解为作为物性的利益、本能和欲望的“欲求主体”将成为现代主体性解放的基本维度。^⑥综合上述观点,可将人的主体性框架总结为“关系”“权利”“欲求”三重维度。本研究将对媒介技术的考察和审视纳入以上三重维度,即基于“人作为关系主体”“人作为权利主体”“人作为欲求主体”三个视角来重新审视现代媒介技术。

三、基于人作为关系主体的审视:超级连接与秩序重构

盖尔·米切尔(Gail J. Mitchell)指出,人是一个经验的统一体,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个体与世界相“连接”的过程中,人类的存在亦被认为是“与世界共同创造自我”的过程。^⑦谢里尔·休斯(Cheryl L. Hughes)在阐述人的主体性问题时亦强调:我们首先不是自主、理性、利己的个体;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3页。

② 詹艾斌:《论人的主体性——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视点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4~1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⑤ [法]米歇尔·福柯:《主体性与真相》,张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9~361页。

⑥ 罗骞、滕藤:《技术政治、承认政治与生命政治——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三条进路及相应的政治概念》,《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27~34页。

⑦ Gail J. Mitchell, Human Subjectivity: The Cocrecreation of Self, *Nursing Science Quarterly*, Vol. 4 (4), 1991, pp. 144-145.

们是社会生物，我们只有在与他人建立的关系中才能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体。^①可见，谢里尔·休斯表明了人的主体性中包含的重要维度，即人对“关系”的实践；而盖尔·米切尔则指出了在“关系”实践过程中“连接”的重要意义。因此，当把人作为关系主体来审视媒介技术时，现代媒介技术集中反映了人类信息传播实践过程中所追求的人与人的“连接”以及人与社会的“连接”，即人类通过连接建立彼此的关系，并最终实现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

（一）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人类的超级连接（Superconnected）

回溯历史，自中世纪开始，教会统治与封建割据不仅带来了人们思想的禁锢，也导致人们赋予交流观念以神秘主义的倾向。这种神秘主义认为，通过一定的非科学的手段能够为不在场的受众积极创造现场感，这一思想可以看作现代媒介技术追求人类社会各组成部分实现“超时空连接”的历史源头。文艺复兴之后，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又将交流的物质意义彻底转向了精神层面。与此同时，人们对交流的理解囿于对“天使”“催眠术”“招魂术”等形而上层面的想象中。人们羡慕“天使”世界交流的跨时空、无障碍，期待通过“催眠术”“招魂术”等精神手段实现人与人之间超越地理距离的“连接”。彼时的传播观念始终把时间、空间的融合与人类彼此的跨时空“连接”当作交流的最高期待，只是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这种期待才完全由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主导。从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的不断扩张，到工业时代对“‘电’能够传递讯息”这一特质的发现，再到电报的发明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各部分的跨时空“连接”，人们通过对媒介技术手段的改进，向着“更快捷、更方便地建立关系”这一目标迈进。

按照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于理性主义的技术话语一度抛弃了神秘主义，在交流观念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这种带有工具理性色彩的技术话语认为：电报和广播之类的新技术使交流的意义由“实在的物质转移”变成“超时空的信息连接”，人类交流的不完美可以借助媒介技术的改变而得到改善。^②由此可见，技术话语的内涵便是：媒介技术支配人类的“连接”过程，进而完善人类的“关系”建构。而技术作为“连接”人类彼此的中介，通过媒介实体影响他者和社会，人们彼此“连接”过程中所引发的“关系”障碍也可以借由技术的力量而消除。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指出，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将有可能使一种替代模式促成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该系统将是对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分明。^③这种局面的产生表明，人类社会的各部分正在通过媒介技术的逐步进化建立一种新的传播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超级连接”的状态。如今，互联网的存在使整个世界开始融合，时空边界趋于模糊。正如玛丽·吉科（Mary Chayko）所言，我们的社会是具备超级连接特质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以如此多的方式与其他人连接在一起，并且这种超级连接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④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当前，玛丽·吉科所言的“超级连接”也意味着，媒介技术的进化过程始终内嵌着通过新“连接”建构新“关系”的基本属性。

① Cheryl L. Hughes, *Re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of Human Rights*,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25 (2), 1999, pp. 47-60.

② [美]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③ [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④ Mary Chayko, *Superconnected: The Internet, Digital Media, and Techno-Social Lif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7, pp. 1-2.

（二）现代媒介技术重构人类秩序

雅克·埃吕尔曾悲观地指出：“技术形塑了一个技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技术自身的规律所控制而忽视了既有的传统。”^①媒介技术只是技术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内嵌了信息传播边界的延拓和空间、时间的破碎。当媒介技术嵌入社会，人们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和时间分割实现了再分化，这种再分化可以理解为新的媒介技术对人类个体生活的“殖民”，同时又又可以理解为人类个体在技术嵌入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新连接、新秩序的“再造”，这种“再造”引发了人类对既有秩序的维护和对现代化进程的双重追求。当“身体”不必在场，连接已然变了模样，那么这种连接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秩序与人的主体性有着怎样的本源联系呢？对此，我们需要回到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中来。

对于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曾评价过两种较为流行的认知：其一，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技术是作为人的行为。^②海德格尔认为，这两种观点其实是一体化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通过技术将事物所蕴含的期待与渴望进行解构与展现。^③整个过程在海德格尔那里被称为“使尚未在场的东西进入在场之中而到达”。^④换言之，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⑤如海德格尔所述，这种解蔽方式同样适用于现代技术，只是对于现代技术而言，这种“解蔽”已然成为一种调试，海德格尔称之为“促逼”，也就是人类通过技术蛮横地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储藏的能量。^⑥回到媒介技术来看，人类不满足现有的旧关系，而要通过现代媒介技术进行暴力调试，要求彼此建立各类新的“关系”。事实上，关系的建立并非一定要通过现代媒介技术来实现，只是现代媒介技术解蔽了隐藏在其中的人类自古以来对“连接”的渴望，这种渴望随着技术的进化而不断向前，新的媒介技术也就随之越来越强大而蛮横无理，这在客观上成为一种“促逼”的方式。与此同时，调试过后的“关系”造成了传统秩序的破坏和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海德格尔对此提醒道：“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意见：技术的制造使世界井然有序。其实恰恰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一种 *ordo* [秩序] 即任何一种等级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从等级和出于存在的承认而来的可能渊源的领域破坏掉了。”^⑦海德格尔所言的“秩序”就是一种经由技术的“促逼”而“再造”的社会秩序。在现代媒介技术的环境下，由于连接的无度和关系的再造，“促逼”使社会秩序本身不再具有规定性。实际上，人类社会秩序正是在媒介技术的进化过程中实现了一个从祛序到构序的过程。归根结底，技术背后的人是构序的主体，而技术的生产者——人类，也作为“促逼”和“解蔽”的主体角色诠释了现代媒介技术的本质——“处处被订造而后立即到场”^⑧的人类秩序重建。

①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trans. John Wilkinson, p. 14.

②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5页。

③ 对此，海德格尔使用了源自希腊哲学的四因说来解释，分别是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结果因。他以祭器银盘为例进行阐释，银盘即由银的质料、盘的外观以及限定在祭祀和捐献的领域内三者所招致。由是，祭器这个界定者终结。然而，终结之后者银匠考虑并聚集以上三种招致的方式，从而使银盘的目的性功用展现出来，最终，四者浑然一体。参见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第926~927页。

④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第929页。

⑤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第932页。

⑥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第932~933页。

⑦ [德]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页。

⑧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第935页。

四、基于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审视：规训权力与“全景敞视主义”

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实践包含了人类对自身自由权利的渴求与期待。有学者指出，权利主体意味着现代人在交往活动领域中的解放。^①而在现代媒介技术构成的社会里，媒介技术从规训权力到“全景敞视主义”，实现了对人类权利的建构与消解。雅克·埃吕尔曾说：“技术社会是一个内嵌了技术系统的社会，但这并不是系统本身。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混乱、冲突等紧张关系……技术系统也在社会中造成混乱、不合理、不连贯，并对社会环境提出挑战。”^②其所警惕的“混乱”“冲突”等后果促使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和平等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媒介技术在为人类赋权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对自身权利回归的不断渴求。

（一）现代媒介技术具有规训权力的属性

随着人类社会彼此“连接”的深入，人类该如何重新认识媒介技术引发的自身权利回归的问题？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对技术有过追问：每一项技术都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福祉，但科技将给谁更大的权力和自由？谁的力量和自由会因此而减少？^③上述追问实际上道出了关于信息时代媒介技术的一个基本认识，即在媒介技术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秩序背后，是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如前文所述，海德格尔指出，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④“而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的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这种促逼之发生，乃由于自然中遮蔽着的能量被开发出来，被开发的东西被改变，被改变的东西被贮藏，被贮藏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重新被转换。”^⑤那么，这些环节究竟如何运作才引发了技术的解蔽呢？对此，海德格尔解释道：“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乃是解蔽之方式……解蔽向它本身揭示出它自身的多重啮合的轨道，这是由于它控制着这些轨道。这种控制本身从它这方面看是处处得到保障的。控制和保障甚至成为促逼着的解蔽的主要特征。”^⑥在海德格尔这里，技术的解蔽本质上是一个再分配和再控制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体现了现代技术的权力属性，也引发了技术背后所体现的人的主体权利问题。

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对技术权力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福柯曾分析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在学科实践和规范话语中运用的“微观权力机制”。福柯认为，存在一种将个人建构成与权力和知识相关的因素的技术，在这类技术中，个人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也是福柯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这些特殊技术最终将个人建构为温顺的主体，这个过程的实现被称为一种“规训权力”。^⑦相较古代社会，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知识和权力的交织是最深入和全面的，现代技术往往嵌入了整个社会，而主体人则在现代技术的规训权力中忽略了知识和权力的交织，自觉服从于蕴

① 罗骞、滕藤：《技术政治、承认政治与生命政治——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三条进路及相应的政治概念》，《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31页。

②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trans. Joachim Neugroschel, p. 18.

③ 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p. 5-11.

④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第932页。

⑤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第934页。

⑥ [德] 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第934页。

⑦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18页。

藏在现代技术之中的权力规则。因此,在福柯看来,规训“造就”个人。^①在福柯的权力观之下,现代媒介技术蕴含的权力同样并非禁锢于司法系统之中,而是通过人们所使用的各类媒介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弥散在人们的关系网络中,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现代媒介技术内嵌的权力也并非强制性力量,而是社会系统中自由、散落、漫布的无声场域。面对这种“沉默的权力”,人们痴迷于现代媒介的使用,无法离开现代媒介技术所形塑的现代生活,从而丧失了诸多在传统媒体时代所培养的获取信息和社会交往的能力,只能在现代媒介技术的不断进化中追求一种高效而智能的“现代性”。正如福柯所言,“有一秘密的力量就像物体引力作用一样永远驱使我们追求我们的幸福”。^②这种表象的技术温和也提醒我们:现代媒介技术具有规训权力的属性,它实现了对人类主体的形塑,人类亦在现代媒介技术所重构的秩序下不断演化、分化、被定制,人类的权利在现代媒介技术的规训权力之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

(二) 现代媒介技术引发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

现代媒介技术的规训权力属性塑造了现代社会的个人,人的主体权利在技术规训的状态下丧失了自主性,本应成为共同体的人类被技术割裂成了不平等的群落和个体。在现代媒介技术的包围中,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对人的个性化定制,人也在这种规训中慢慢习惯于“成为自己”,而忽略了丰富的“身外之物”。如福柯所言,“这种规训的艺术并不是要把它的对象变成没特色的、整齐划一的存在;相反,它要对它的对象进行分析、区分、归类,建立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它把个人视作操练对象,也视为操练工具。它不是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权力,相反,它变得小心翼翼,精心计算”。^③技术的规训权力热衷于精心计算、持久运作,虽然模式、程序可能微不足道,但它们正在嵌入社会的每个细胞。为此,福柯吸收了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重新构建了一个监狱系统来模拟社会各个阶层,即所谓的福柯式的“全景敞视主义”监狱,以此说明规训权力所引发的后果。

在这套系统中,每个人都置身于权力的网内,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福柯用监狱象征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这座监狱通过权力构建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整个现代人类文明体系,其内在的知识型权力遵循的真理方式是监视。因此,福柯亦认为,监视是现代科技所遵循的新的权力。^④对于现代媒介技术环境来说,“全景敞视主义”即表明,除了媒介技术本身,所有人都在被全方位监视而又看不见是谁监视了自己。数字时代的媒介技术正是这样温和而强大的技术,如大卫·莱昂(David Lyon)所言,现代媒介技术的监视已经从旧民族国家溢出,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表象。如今,无论是在工作、在家、在玩耍还是在移动,我们都在被现代媒介技术监视,它们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追踪平凡人的活动。^⑤而吉隆·奥哈拉(Kieron O'Hara)等也指出,如今,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彻头彻尾的监视社会,但他们也强调,监视是对人们开展的有目的、常规性、系统性和有针对性的观察与检验,在监视社会中,它被用来达到控制、授权、管理、影响和保护的目的。^⑥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媒介技术的监视行为并不都是非正义的。如今,现代媒介通过各类技术手段获得了

①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193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117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陈怡含编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④ 于骥鸣:《后现代网络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3页。

⑤ David Lyon, *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Computer Codes and Mobile Bodies*, in *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3.

⑥ [英]奥哈拉、[英]沙德博尔特:《咖啡机中的间谍:个人隐私的终结》,毕小青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5页。

人们的基本信息。可以说，每个被现代媒介技术包裹的人都成了透明的数据人，整个社会在这种数据化的生产和定制中形成了媒介技术场域下的全景监狱，现代媒介技术的监视行为也随之而来。当然，监视的存在不一定就是有害的，监视很可能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利益，这也是人们创造现代媒介技术的一个良好愿景。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监视的后果直接引发了现代媒介技术对人类权利主体的解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权利主体身份被消解，所谓身在其中而不由己、身在其外而不自知。因为在媒介技术的监视之下无法获得权利主体的自主性，人们并没有实现自由选择自身权利的愿望，而现代媒介技术也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合理性中被理解和反思。

五、基于人作为欲求主体的审视：数字生命政治与人的生存美学

马克思曾表明：“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① 就人作为欲求主体的维度来说，人的主体性的解放还意味着人的物性生命得到肯定和承认。^② 当现代媒介技术不断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之时，人类借由现代技术实现对自我的治理。媒介技术在塑造人类社会的图景、决策、行为和观念方面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只是我们需要看到，媒介技术在规训人的同时，也通过满足人类的欲求和本性管理、治理着人。如今，现代媒介技术正在助力形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有必要借用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概念来审视现代媒介技术。20世纪70年代，福柯在一次授课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生命政治源自生命权力，它有别于君主权力和规训权力而成为第三种权力形式。福柯指出，生命政治关注对大众人口的治理，其目标并非通过权力惩罚肉体、规训个人，而是面向大众，通过新的权力形式和治理技艺让大众的生活更幸福。^③ 因此，从本质上讲，生命政治追求的权力形式是“向善”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其中，福柯还重点提到，生命政治需要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后果赋予权力和干预手段。^④ 对于现代媒介技术所形成的环境来说，其引发的后果已如前文所述，因此，现代媒介技术需要在不断完善的同时，完成对规训权力和“全景敞视主义”的超越，以帮助人类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真正自由与解放。为此，我们应为现代媒介技术赋予生命政治的取向。

（一）“机器能尽其所用”与“图灵之问”——从生命政治到数字生命政治

1934年，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进行追问：“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出现，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些片断……确实，我们在能源方面，在生产出来的产品方面，成果累累，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形式变得单调，生命变得枯萎。是什么限制了机器带来的福祉？在什么条件下，机器能尽其所用，得到最大的成功？”^⑤ 1950年，英国著名数学家A. M. 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发表《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他在文中提出：“机器能够思维吗？”^⑥ “图灵之问”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思维联系显露台前，对刘易斯·芒福德曾经提出的“让技术采用类似有机生命的方法来呈现”这一描述进行了回应。两位思想家对技术的阐释秉持了“人”的基底，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② 罗睿、滕藤：《技术政治、承认政治与生命政治——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三条进路及相应的政治概念》，《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27~34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266页。

④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268页。

⑤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第9页。

⑥ [英]A. M. 图灵：《计算机器与智能》，[英]博登著：《人工智能哲学》，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在“人”的背景下想象技术。由此，关于媒介技术的讨论开始从“机器能尽其所用”到“图灵之问”，并剑指人工智能。实际上，这也引发了媒介技术从生命政治向数字生命政治的跃进。福柯所言的生命政治并非发生在数字时代，彼时对大众的治理围绕医疗、生态、弱势群体、地理环境等传统领域，如今在现代媒介的加持下，各领域的治理都在寻求大数据、算法等新技术手段支持。简言之，现代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旧时代的数字环境，所有的生命政治在数字环境中都具有了数字化的特性。因此，生命政治也就转化成了数字生命政治。显然，数字生命政治更关注在数字环境中，现代媒介技术何以可能释放新的治理技艺，以实现大众的高质量生活和人类的主体性复归。

多年来，人们不断询问关于“人”“机”之间的边界问题，关注其引发的人的主体性危机。随之而来的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在不断完成人类欲求的同时，也让人机边界问题再度成为人们讨论媒介技术的重点。当赋予了现代媒介技术数字生命政治的取向，人们对基于数据和代码的现代媒介技术也就必然会产生怀疑和恐慌，担心数字化机器有了人的思维，最终超越人类、控制人类，就像有学者将数字时代概括为这样的现实：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黑箱社会”中。例如，弗兰克·帕斯夸里（Frank Pasquale）就认为，这是一个充斥着“神秘技术”的社会。^①他的核心观点是，媒介技术所蕴含的价值和特权隐藏在“黑匣子”里。但我们也需要看到，现代媒介技术远没有达到对人类社会进行精准复制和描摹的程度，如今的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重组和监视大多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很多时候，这些数据化的资料无法与传统的经验和现象的直观相媲美。例如，算法推送只是基于机器对“个人”日常数据的搜集，而无法代替“在场”的触摸与感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媒介技术往往只是折射了现有社会的逻辑，而不能实现精准、完善的定制过程。正如大卫·贝尔（David Beer）所说，这些媒介技术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现有的分类方法和人类的思维背景下。^②问题的关键在于，媒介技术实现了对旧秩序的重构，而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个从祛序到构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是我们应当传承的，又有哪些是变化的、对我们不利的，这些新局面对人类来说有哪些是福音或是灾难？未来，我们需要超越边界思维而从数字生命政治的高度去审视媒介技术，其核心是找到技术背后人的欲求所在。

（二）现代媒介技术中人的解放——生存美学路径

从“超级连接”到“秩序重构”，从“规训权力”到“全景敞视主义”，前文对现代媒介技术的审视围绕人的“关系”主体和“权利”主体，这种审视的过程使我们自然反思一个问题，即在人的主体性受到冲击的时刻，人类该如何反抗、如何重新获得主体性呢？这从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可见端倪。福柯的生存美学视野不同于传统的伦理学，虽然提倡的是关注自身和满足欲望，但是目的在于调整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调整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并最终调整人与自我的关系，使主体性问题能够得到廓清。^③相较生命政治，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提出的生存美学概念为人在权力视域下的主体性建构指明了新的方向。福柯讲到，生存美学的核心实质上就是关于人自身的问题，身体、性、爱欲、语言共同组成了生存美学，在这些领域，人们都需要回归自我。概言之，“就是把审美创造当成人生的首要内容，以关怀自身为核心，将自己的生活当成一部艺术品，通过思想、情感、生活风格、语

① Frank Pasquale,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

② David Beer, *The Social Power of Algorithm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20 (1), 2017, pp. 1-13.

③ [法] 米歇尔·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陈怡含编译，第 268 页。

言表达和运用的艺术化，使生存变成一种不断逾越、创造和充满快感的审美享受过程”。^①但这样说还不够，其实这种生存美学不在乎那种关于心灵的哲学理论，而主要关注自身应以“何种技术”了解自身、认识自我、管理自我，即关注“自我技术”。

在《主体解释学》中，福柯认为至少需要通过“聆听、书写、反求诸己”^②来求得真理。这是“关怀自身”的技艺，也是“自我技术”。这种“反求诸己”提示我们，要适当地脱离现代媒介技术，培育我们自身传统的技艺。无论是“聆听”还是“书写”，作为一种自我技术的实践，它们代表着人类在非数字时代实现传播与交流的原动力，也正是这种“传统”让人能够自主选择、自主实践。然而当前，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数字化的，人的生命正在以一种“数字化生存”的形式延续。在大多数时间里，现代媒介技术占据了人们的个人空间，他们畅游在数字和信息的海洋里，被媒介技术形塑、改变，逐渐忘记自己内心和身体里本应存在的“自我技术”。作为一种外在的权力形式，现代媒介技术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使“自我”不断向着“客体化”的人转变，而生存美学提倡“自我技术”是为了赋予人类更多的自主性，旨在让人类成为主体、回归“自我”。因此，福柯说：“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③这也是在现代媒介技术环境中，人类实现主体性回归与解放的生存美学路径。

六、结语

随着现代媒介技术不断进化，人的主体性持续受到冲击。人类创造技术的初衷是通过提高效率、完善过程等手段帮助人们改善现实处境，然而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警示的那样：一种新的宗教再次掌控了精神世界，新的机械化图景在这种新旧交替中拔地而起。^④因此，对媒介技术的审视需要超越“物质性”维度而转向人的主体性维度。对于现代媒介技术环境来说，与其说媒介技术作为“物”和“工具性”的存在逐渐弱化了“人”的价值和主体性，倒不如说“人”应当在“媒介技术”所重新建构的世界中不断调整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不断调整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并最终调整人与自我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媒介技术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本质上仍是人的主体性问题和人类自身解放的问题。

从旧媒介到新媒介、从传统媒介到现代媒介，媒介技术在逃离蒙昧时代的途中也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建构。“现代性”始终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伴，人类对自身在世存有的理解由此回归到了现实世界之中。“现代性”的初衷是逃离迷信与神性，强调人类权利的平等、自由，并以此重建此岸的生活，以实现人类的解放。然而，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亦生发出了新的超级连接、秩序重构、规训权力、全景监狱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模糊地带：从“人作为关系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了人类的超级连接与社会的秩序重构；从“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本身具有规训权力的属性，引发了技术的“全景敞视主义”；从“人作为欲求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了向数字生命政治的跃进，提醒我们未来的价值指向应是“回归自我”的人的生存美学创造与人的主体性解放。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人，才是人类自身的最高创造。^⑤

①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④ [美]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下卷）：权力五边形》，宋俊岭译，第21页。

⑤ [美]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下卷）：权力五边形》，宋俊岭译，第416页。

本研究所提出的人的主体性三维框架也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对媒介技术的审视应超越人与物之间的分野，从技术的表象中看到人的存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应围绕人的主体性来行进，以“把人性摆上生命世界最高峰位置”^①为最终目标。

(责任编辑：何晶 任朝旺)

Super Connection, Disciplinary Power and Digital Bio-Politics: Re-Examination of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Subjectivity

Li Yingqi

Abstract: As an introspection of “technology determinism” and “media materiality” in the previous media technology research,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ssue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and re-examines the technology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human subjectivity, so as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such technology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elf-liberation in futur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subjectivity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human beings as the subject of relationship, rights and desire. In the first aspect,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has realized super connection 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second aspect,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possesses an attribute of disciplinary power, which also leads to the “panopticism” of technology. In the third aspect,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has taken a leap forward to digital bio-politics, with its future value orientation expected to be the cre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esthetics, characterized by returning to oneself, and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The examin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should transce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objects, and see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echnology, which means that futur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should focu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modern media technology; human subjectivity; super connection; disciplinary power; digital bio-politics

^① [美] 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下卷）：权力五边形》，宋俊岭译，第412页。